

藏文文献所见于阗佛教^①

才吾加甫

内容提要：本文对汉、藏文文献中佛教初传于阗及发展情况进行了分析比对，认为这些材料虽充满了神话色彩，但能相互印证，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于阗佛教 《于阗教法史》 《汉藏史集》 《土观宗派源流》 《宋云行纪》 《大唐西域记》

中图分类号：B9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743（2011）04—0075—04

吐蕃经略于阗一个多世纪，吐蕃人和于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接触和交往中，互相影响、互相学习，不断加强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吐蕃与于阗之间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直持续到公元11世纪。藏文文献包括三大类：石碑铭刻、写本手卷、竹木简牍，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古代于阗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民俗、文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珍贵史料。于阗作为我国西域的佛教名城，历来享有“小西天”或“佛教的第二故乡”之美称，于吐蕃的宗教文化意义尤为突出，《汉藏史集》将于阗定位为“圣地”。《于阗教法史》、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中的《于阗悬记》、达仓宗巴和班党桑布著的《汉藏史集》、罗桑却吉尼玛著的《土观宗派源流》、根敦琼培著的《白史》等许多藏文文献史料，都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记述了于阗佛教。

一、佛教初传于阗的情况

关于佛教初传于阗的情况，藏文文献中有如下不同叙述：

1. 《于阗教法史》中记载“救渡世人之弥勒菩萨与圣者文殊菩萨，知西域乃三世佛福田之一，为了作西域人众之善知识，他俩降世至西域，先到杂尔玛局园里，弥勒菩萨（化现之身）当了国王尉迟森缚瓦，圣文殊化身为毗卢遮那比丘。住在杂尔玛局园里，首先教牧童文字和语言，遂圣教诞生了。随后，国王尉迟森缚瓦为圣者文殊菩萨之化身毗卢遮那比丘，首先修建了西域的杂尔玛寺庙。”^②

2. 《汉藏史集》中记载“这以后，有地乳王之子叶吾拉建五城之城。于阗立国后六十五年

① 本文系201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疆佛教兴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②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民族出版社，1985年，第254页。

之时，即叶吾拉王之子尉迟森缚瓦即王位五年时，佛法开始传到于阗国。这是由弥勒佛化身为尉迟国王，文殊菩萨化身为圣者毗卢遮那，先教给牧人之子以文字和语言，然后佛教才开始逐渐传布。尉迟森缚瓦国王修建了杂尔玛佛殿，殿内有龙王胡洛尔通过天空从克什米尔迎请来的有护持力的佛塔，这是于阗最早的佛殿和佛像。”^①

3. 《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 “当他的后裔弥勒菩萨化身的阎耶桑巴哇王时，有比丘毗卢遮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创造了于阗文字。王为此修建杂尔玛寺。”^②

以上三种引文，在内容上有共性。即：1. 弥勒菩萨化身为于阗国王，文殊菩萨化身为毗卢遮那；2. 毗卢遮那创造了于阗文字，佛教始传于阗；3. 国王修建了杂尔玛佛殿。从中不难发现，三种文献似乎都出自同一资料，或者都受到了同一种传说的启发。从时间上看，敦煌藏文写卷大大早于其余两种文献，最具权威性。据考证，作为敦煌古藏文文献的《于阗教法史》形成于吐蕃时期，是公元8~9世纪间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是《汉藏史集》（成书于1434年）、《土观宗派源流》（成书于1801年）等涉及于阗佛教的文献所依据的唯一原始资料。

二、于阗佛教的发展

藏文文献对于阗佛教的发展有如下记述：

1. 《于阗教法史》中记载 “为使西域圣教不灭，有护法神八尊发心保佑之，此即护法神北方天王，近地长官、阿巴若致达、噶哈那萨若、苏喀若那玛拉、甲吉、斯达那巴帝、龙王格日哈天等，发誓追随其后之眷属，计有三万五千五百零七名护法神保护。四大龙王保佑圣教及其地方，名谓‘四护’。五百尊菩萨常住彼处，二百五十位以比丘及比丘尼之身常在，二百五十位以优婆塞、优婆夷之身常在。海子里最初长出莲花之处，广建伽蓝寺宇。在牛头山、瞿摩寺、贡邦、杂玛、卓尔帝、达玛帝、桑帝、桂仲等地，寺庙有灵异者计三百三十三座。八位天生的菩萨，现在还在西域，他们的名字是：金刚手密教之主，现居于牛头山的阶梯山顶雄甲；观世音居于菊年；虚空藏居于桂仲；文殊和牟尼巴瓦二者居于牛头山；地藏王居于卓尔帝；普贤居于多雷僧伽保陵；药师王居于玛诺觉；弥勒菩萨居于麦诺聂。大乘、小乘二道所执见各异。……在西域于阗地方，二部比丘及比丘尼有四千七百余。在吉勒羊以下，高涵和杜尔耶以上，有比丘和比丘尼五百三十余人；在康相，比丘二部众有二百五十余人；吉勒羊以下，高涵与于阗以下和康相以上，总的比丘及比丘尼二部众，自己有土地、牲畜、奴仆的比丘和有施主的比丘共五千四百八十余人。现在这些比丘里，化身为菩萨替众生行善者极多。”^③

2. 《汉藏史集》中记载 “总的来说，于阗地方的大寺院在城内外有六十八座，中等寺院有九十五座，小寺院有一百四十八座。另外，荒地小庙及不属寺庙之佛像、佛塔等，共计三千六百八十八处。据桂·措衍金波鼠年统计，于阗地方共有比丘一万来名。在朵洛和墨格尔地方，有大寺院四座、小寺院一百来座、比丘一百二十四名。在于尚、帕涅、比尔迦札、沃古以上智里以下的地区，城内外有寺院二十三座、中等寺院二十一座、小寺院二十三座、荒地小庙和佛塔等八百

①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 《汉藏史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页。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 《土观宗派源流》，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33页。

③ 陈践，王尧编注 《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第255页。

三十九处。两部僧伽在勒见和贵泽以上地方有四百三十八名。金江以下格香和杜尔雅以上地区的城内外、察尔玛以上地区，有大寺院十五座，还有很多小寺院和佛塔。两部僧伽从勒见和贵泽地方以上总计九百六十三名。”^①

3. 《土观宗派源流》中记载 “从此以后，佛教在此地大为宏扬，法王亦相继出世，建立的伽蓝及佛塔之多不可胜数。”^②

我们对上引三种文献稍作比较，就不难看出，对于阗佛教发展的记述，《土观宗派源流》一书简短而概括，而敦煌写卷《于阗教法史》和《汉藏史集》对兴隆时期的于阗佛教则作了细致的考察，当然这种考察，只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不可视为完美无缺。《于阗教法史》对西域佛教的描述相对较系统，从于阗佛教的诸多护法神谈到佛教八大菩萨，继而介绍了大、小乘不同派别及其信仰者僧尼之具体人数。而《汉藏史集》的重点则在寺庙、僧尼等的数目统计上，因此，这方面它较敦煌写卷《于阗教法史》显得更详尽。从以上引言中的寺庙、僧尼数字可曲折反映当时于阗佛教之兴旺。

《于阗教法史》、《汉藏史集》、《土观宗派源流》等藏文文书所记述的于阗佛教方面的情况和部分汉文史料之记述有一些相似之处。汉文文献《宋云行纪》、《大唐西域记》和藏文文献《于阗教法史》、《土观宗派源流》的记载很接近，有一脉相承之感。

《宋云行纪》中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记载是 “于阗王不信佛法，有商将一比丘，名毗卢旃，在城南杏树下，向王伏罪云 ‘今辄将异国沙门来在城南树下’。王闻忽怒，即往看毗卢旃，旃语王曰 ‘如来遣我来，令王造覆盆浮图一躯，使王祚永隆’。王言 ‘令我见佛，当即从命’。毗卢旃鸣钟告佛，即遣罗睺罗变形为佛，从空而现真容。王五体投地，即于杏树下置立寺舍，画作罗睺罗像，忽然自灭。于阗王更作精舍笼之，令覆盆之影恒出屋外，见之者无不回向。”^③

《大唐西域记》中也有类似的一段记载，但其内容更为详细 “王城南十余里有大伽蓝，此国先王为毗卢折那（唐言遍照）阿罗汉建也。昔者，此国佛法未被，而阿罗汉自迦湿弥罗国至此林中，宴坐习定。时有见者，骇其容服，具以其状上白于王。王遂躬往，观其容止，曰 ‘尔何人乎，独在幽林？’ 罗汉曰 ‘我，如来弟子，闲居习定。王宜树福，弘赞佛教，建伽蓝，召僧众’。王曰 ‘如来者，有何德，有何神，而汝鸟栖，勤苦奉教？’ 曰 ‘如来慈悯四生，诱导三界，或显或隐，示生示灭。遵其法者，出离生死。迷其教者，羁缠爱网’。王曰 ‘诚如所说，事高言议。既云大圣，为我现形。若得瞻仰，当为建立，罄心归信，弘扬教法’。罗汉曰 ‘王建伽蓝，功成感应’。王苟从其请，建僧伽蓝，远近咸集，法会称庆，而未有犍椎扣击召集。王谓罗汉曰 ‘伽蓝已成，佛在何所？’ 罗汉曰 ‘王当至诚，圣鉴不远’。王遂礼请，忽见空中佛像下降，授王犍椎。因即诚信，弘扬佛教。”^④

藏文文献《于阗教法史》和《土观宗派源流》中，关于佛教传入于阗的传说与上述二则很近似，传教高僧毗卢遮那，与毗卢旃、毗卢折那译音正相对应。《于阗教法史》曰 “尉迟森缚瓦国王到于阗碣楼城之东南方向巡视，见城外面有金银色麋鹿。国王乃与随从等尾追，至牛头山

① 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 《汉藏史集》，第51～52页。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 《土观宗派源流》，第233页。

③ 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7～48页。

④ 杨建新主编 《古西行记》，第99页。

下塔著处，见那麋鹿却又变成夜叉王遍胜，夜叉王遍胜向于闐王说道‘啊！大王，您在这里建一大塔很合适啊’。国王说‘为谁修塔？’‘为佛的使者阿罗汉布达和僧伽斯达、僧伽菩扬、僧迦斯达纳这四位，他们是作为您的善知识者而来的，为他们建塔呀！’刚说完，四位阿罗汉真的立即到来，（向国王）讲经，王顿生敬信。于是，就在此地树起建塔的橛子，修起了瞿摩帝寺庙大宝塔。”^①

《土观宗派源流》中也有与《于闐教法史》相似的记载“如薄迦梵曾在《于闐悬记》和《牛角悬记》等经中所预示，于闐在佛圆寂后一百一十七年法王阿育王的王妃承蒙毗沙门天赐给一子，名瞿萨旦那（地乳）。毗沙门天又将此子授与汉皇帝。此子率众万人寻找本土。正巧有达磨阿输迦王的宰相耶舍及其部众七千人，被王逐出，二人相会于闐，遂占有其地。当到了他的后裔弥勒菩萨化身的闐耶桑巴哇王时，有比丘毗卢遮那是文殊菩萨的化身，他创造了于闐文字。王为他修建杂尔玛寺。当时欲建修寺庙和佛塔之人甚多，遂将所得到的佛舍利子用来修建寺庙和佛塔。王令毗卢遮那迎请十六尊者入于闐供奉。此后到了于闐王七世毗闐耶毗罗玛时，从天竺来了四位阿罗汉，遵从佛所授记，王修建了迦叶宝塔，并在牛角山上建立格托善伽蓝。”^②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宋云行纪》和《大唐西域记》所记传说，实为一事，毗卢旃即毗卢折那。于闐传教者的来处，《宋云行纪》称“异国”，《大唐西域记》明言“迦湿弥罗国”即今克什米尔。《于闐教法史》与《土观宗派源流》的说法和上述两则用汉文记录的传说暗相印证。

近一个世纪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佛教传入西域的重要资料，基本来自汉文和藏文两大体系，这两大体系中的文字记载都是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的宗教传说。我国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民族缪悠之传说，虽若为情理所必无。然其中必有事实存焉。披沙拣金，往往见宝，正不容以言不雅驯，一笔抹杀也。”^③当然，对于古代的神话传说，我们不能当做信史。但神话传说也是基于现实生活的，是当时人们的现实生活、劳动和斗争的产物，并非出于人们头脑里的空想。只要我们剥去它所包含的神秘外衣。神话传说也就充分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面貌。总之，古老的神话传说和故事虽然同历史事实有区别，但又曲折地反映着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言“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④。

（作者单位：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

责任编辑：陈霞

责任校对：李文博

① 陈践，王尧编注《敦煌本藏文文献》（藏文），第256页。

② 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注《土观宗派源流》，第233页。

③ 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111页。

④ 摩尔根《古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173页。